

#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李伯谦

Civilization, class society and state are different generalizations for a society of specific development from various angles. like other things,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process of origi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neolithic periods, it is not qualified for the appearance of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However, some elements of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tentatively in the late neolithic—the Yangshao period. The chalcolithic period or Longshan times was a transition 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The real civilization of China did not come until the Erlitou Culture or the Xia Dynasty.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过去单纯依靠古代遗留下来的少量文献史料，很难作出满意的回答，人们对中国上古时代历史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历史的阶段。自从本世纪 20 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学的飞速发展，犹如打开了一部部无字地书，大量重要而新鲜的实物资料不断涌现。依照考古学的研究程序，解读这些无字地书，将地下出土的丰富的实物史料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史料有机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学者们不仅已经将过去视为传说时代的商代历史变为信史，确认商代是拥有发达的青铜工业、城市生活、礼仪制度、宗教系统、文字、艺术和国家机构的发展程度较高的早期文明社会，而且建立起了各个地区古文化发展序列和分期标尺，为探讨中国更早的文明社会、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奠定了科学的坚实的基础。

文明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中国古代什么

时候开始出现文明因素？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文明阶段？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如何？在当前学术界围绕这一课题所进行的热烈讨论中，笔者也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

## 一

尽管历史上学术界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在当前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大家并没有将“文明”等同于“文化”，而是将文明视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应该说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在我看来，文明、阶级社会、国家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特定社会发展状况所作的概括。不能设想，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地区，社会尚未发生阶级分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尚未出现。反之，也不能设想，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已经建立国家的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还停留在蒙昧、野蛮状态。当然，文明也象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蕴育、产生、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社会进入文明阶段

以前,文明因素很早便已产生,只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最后进入文明。文明与文明因素、文明社会与文明起源是互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概念。

## 二

如果我们对“文明”含义的理解基本不错,那么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文明因素,文明因素产生的过程如何呢?

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从公元前九至八千年左右逐步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通过对河北徐水县南庄头<sup>[1]</sup>、江西万年县仙人洞<sup>[2]</sup>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生活来源的主要手段仍是渔猎和采集,农业可能刚刚发明。大约从公元前六千年后,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sup>[3]</sup>、磁山文化<sup>[4]</sup>、裴李岗文化<sup>[5]</sup>、后李文化<sup>[6]</sup>,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sup>[7]</sup>、城背溪文化<sup>[8]</sup>,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sup>[9]</sup>等,是这时期涌现出来的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时期,农业已由先前的附属地位跃居为主要的经济部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主要种植粟类作物,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主要种植稻类作物,居民的食物有了比较稳定的来源。而墓葬排列有序的墓地的营建、祭祀遗迹的存在和装饰物品的使用,表明居民的精神生活也较前有所扩大。但考古材料呈现出来的总体面貌仍然是:生产领域比较狭小,生产品没有太多剩余,精神生活并不丰富,人们还过着相当低下的生活。显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乃至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文明因素产生的条件尚不具备,文明因素还没有出现。

约公元前五至三千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晚期可分为早、晚两段。晚期早段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期)<sup>[10]</sup>、北辛—大汶口文化(早期)<sup>[11]</sup>,长

江流域的大溪文化<sup>[12]</sup>、河姆渡文化<sup>[13]</sup>、马家浜文化<sup>[14]</sup>,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早期)<sup>[15]</sup>等。这时期农业、手工业出现分工,生产规模有所扩大,生产品有了较多剩余,私有制已经出现,作为记事的刻画符号广泛采用,寄托人们情感、反映人们信仰的彩陶艺术十分流行。但陕西西安半坡<sup>[16]</sup>、临潼姜寨<sup>[17]</sup>等聚落遗址的发掘表明,这时期仍然保持着向心封闭式的聚落结构,社会尚未发生分化,平等和民主仍是人们崇尚的最高原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产生文明因素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我们还难以确指哪些是新产生的文明因素,因此将其视为文明因素的蕴育时期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晚期的晚段,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进入自己的繁荣时期;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sup>[18]</sup>,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sup>[19]</sup>。这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业、手工业的分工进一步扩大;手工业内部有了新的分工,制玉和金属冶铸成为新兴的生产部门;遗址中储藏粮食的窖穴的增多,表明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氏族公共墓地中大型墓和小型墓的鲜明对比,表明社会财富已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发生明显贫富分化;遗址规模和内涵的悬殊,是聚落出现分级趋势的反映;红山文化坛、庙、冢等礼制性建筑的兴建,屈家岭文化城堡的出现,预示着氏族权贵阶层的形成、部落之间冲突的加剧和扩大。总之,在这一时期,许多前此不见的新因素相继涌现,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这些新变化,这些相继涌现的新因素,无疑是文明产生的基础,而有些新因素则完全可以肯定其本身就是新产生的文明因素。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大约距今六千年至五千年,是中国古代文明因素在前一阶段蕴育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

从上述文明因素产生的过程可以看出,产生文明因素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是剩余产品的存在,是社会分工的扩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的分化。文明因素既包括物质的,这当然是主要的,但也包括精神的,这也是不可缺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有一个蕴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在新石器时代,文明因素尽管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从总体来看,它尚未能够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文明因素的产生,并不等同于文明社会的开始。那种看到某些文明因素的出现便认为已经进入文明的观点,是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毛病。同样,否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因素的出现是“文明曙光”的提法,不同意在新石器时代探讨文明起源问题也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割裂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使文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三

文明因素一经产生,便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过程。但只有当这些新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文明才算真正到来了。中国考古学上公元前三至二千年左右的龙山时代<sup>20</sup>,正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时期。

龙山时代,黄河流域分布有齐家文化<sup>21</sup>、客省庄二期文化<sup>22</sup>、中原龙山文化<sup>23</sup>、山东龙山文化<sup>24</sup>,长江流域有石家河文化<sup>25</sup>、良渚文化<sup>26</sup>。与前一时期相比,龙山时代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新事物,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项。一是用于防卫的城堡如雨后天春笋般破土而出。黄河流域中原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发现城堡的地点有河南安阳后冈<sup>27</sup>、登封王城岗<sup>28</sup>、淮阳平粮台<sup>29</sup>、鄆城郝家台<sup>30</sup>和辉县孟庄<sup>31</sup>,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发现城堡的地点有章丘龙山镇城子崖<sup>32</sup>、寿光边线王<sup>33</sup>、邹平丁公<sup>34</sup>和

临淄田旺<sup>35</sup>;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内发现城堡的地点有湖北天门石家河<sup>36</sup>、荆门马家垸<sup>37</sup>、江陵阴湘城<sup>38</sup>、石首走马岭<sup>39</sup>。此外,在内蒙古凉城岱海地区<sup>40</sup>、包头大青山南麓和准格尔旗与清水河之间的黄河两岸峭壁上也发现有许多用石头垒砌起来的石城<sup>41</sup>。这些城堡中面积最大的是石家河古城,可达100万平方米。其它如城子崖古城有20万平方米,孟庄古城有16万平方米,丁公古城有12万平方米,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原地区发现的用夯筑技术筑成的古城堡,大都具有规整的形制,一般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如平粮台古城,城内尚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和陶水管砌成的排水管道,南城门两侧有门卫房址,明显具有后世都城中宫城的性质。这些古城堡的分布规律也颇值得玩味,山东龙山文化的4座城堡之间的距离均约在50公里左右,中原龙山文化的几座城堡有的相距也仅100公里左右。一座城堡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其势力所及范围大约在25公里至50公里方圆内,这和后来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的方国分布的密度及规模几乎是一样的。其二是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兴建。可能是由于工作做得不够的缘故,中原地区目前尚未发现,但在良渚文化中却已发现不止一处。上海的福泉山<sup>42</sup>、浙江余杭的反山<sup>43</sup>是人工用土堆筑起来专门埋葬氏族显贵的坟山,反山的用土量估计超过2万立方米,可见其工程之浩大。余杭的瑶山<sup>44</sup>原是一座将红、黄、灰各种颜色的土由山下抬上去堆筑起来的祭坛,废弃后又专门辟为贵族的墓地,与其相似的尚有反山西面不远的汇观山。而最为惊异的则是1987年冬在反山东南大观山果园的发现<sup>45</sup>,这是一座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人工筑成的土台子,土台子上又有三座分别称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的土台子,经试掘,在大莫角山上发现了红烧土,由此推测三座土台子上原来是建

有房子的。这显然和瑶山一样也是一座祭坛遗址。良渚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坟山和祭坛,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的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坛、庙、冢的规模,建造如此巨大的土台,其耗费的人力决不亚于修建一座中原地区的城堡,其功能虽主要是宗教礼仪性的,但其意义也决不亚于城堡的出现。城堡的主人无疑是日常生活中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贵族,埋在大型祭坛上的死者显然是与祭祀有关,在宗教礼仪活动中能沟通天地、交接人神的使者。其实在当时,行政首长也往往是宗教领袖,一身二任,是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其三是玉器的大量制作和使用。玉器中最主要的是琮和璧,在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均有发现,而以良渚文化中发现的最为集中。根据《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和《周礼·典瑞》“疏璧琮以敛尸”等记载,琮和璧既是祭祀天地神祇的祭玉,又是可用来敛尸的葬玉。而依照郑玄的解释,敛尸的琮、璧亦寓有通天地之意。从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来看,以琮、璧敛尸主要见于祭坛上和坟山上的大墓,前面我们曾经推测,埋在祭坛上的死者,其身分可能就是担任祭祀活动的巫师,如此说来,琮和璧应该就是一些宗教首领进行祭祀活动时的法器。反山出土的一件玉琮上刻镂的神徽图像能更清楚地说明其用途<sup>[6]</sup>,该神徽实际上是头戴羽冠、四肢俱全的人神和环眼前视、张口露牙的兽面的结合,是能够沟通天地、交接人神的巫师骑在神兽上正在作法的写照,其它玉琮上所见的兽面纹只不过是这一完整图像的简化而已。由此可见,蕴含着浓厚宗教意识的玉器的广泛使用,表明当时社会上确已分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祭祀礼仪活动的宗教职业者。其四是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早在仰韶时代,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过许多类似图画文字的刻符,因为皆是单个发现,它是否为表义又表

音的文字尚有争论。可喜的是,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五行十一字陶文<sup>[7]</sup>,尽管对其含义尚无统一的看法,但它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的文字已是没有疑义了。其实过去在良渚文化陶器上也发现过一连数字的陶文,只是大家重视不够。如果联系到丁公陶文的发现,我们推断龙山时代已经是有了文字的时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除了以上四项,其它诸如青铜器发现地点的增多、陶质礼器的使用、水井的发明等,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龙山时代是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综观龙山时代的新变化,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生产力较前有较大的提高;社会已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平等和民主已经不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冲突频仍,战争不息,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成为最崇高的目的;聚落分级形成了城乡对立,王权业已出现,宗教、礼仪活动注入了阶级内容;文字成为新的记录与交际工具。一方面是彬彬有礼的“文明”举措,一方面是赤裸裸的掠夺与欺榨。它已具备了文明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只不过当时的国家机器还不象后世那样发达,一个政治实体统辖的范围还比较狭小,因此这个时期实际上具有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由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过渡的特征。从国家形态发展角度考察,一个个以城堡为中心的政治实体就是一个独立的酋邦、一个个雏型国家;从文明发展程度角度考察,文明因素的积累已达到质变点,社会正迈着稳健的步伐跨入文明的门槛。

从对龙山时代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从原始的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步实现的。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应该是文明形成过程的一般规律。同样,凡是具备产生文明因素条件的地方,都会出现文明因素,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几

乎同时产生了文明因素，在走向文明的征途上又几乎是并驾齐驱的。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那种认为中国文明先在中原地区产生，然后再传播到周围地区的观点并不符合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实际。

#### 四

继龙山时代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21—16世纪），与史籍记载的夏代基本吻合。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sup>⑧</sup>，与二里头文化基本同时或略晚，在山东、苏北沿海地区分布有岳石文化<sup>⑨</sup>，在燕山山脉南北分布有夏家店下层文化<sup>⑩</sup>，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分布有马桥文化<sup>⑪</sup>。根据已有考古材料可知，二里头文化是上述几支考古学文化中发展程度最高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县城西南约9公里，是一处范围广大、面积达2500×1500米的大型遗址，从1959年徐旭生调查发现并开始发掘以来，工作迄未停止。通过多年的发掘研究，二里头文化已被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尽管过去和现在对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文化属性一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多年的赵芝荃并论定二里头遗址即夏代最后一个君王夏桀的都城斟鄩<sup>⑫</sup>，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夏代已经是文明时代，夏文化是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不仅先秦文献有明确记载，即从考古材料分析，也应该毫无疑问。

以青铜冶铸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社会进入文明的物质基础。二里头文化不仅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多，迄今已知有青铜工具刀、锥、锯、铤、凿、鱼钩，青铜武器戈、戚、钺和青铜容器爵、斚、盃、鼎、觚等，而且发现有冶铸青铜器的作坊址，这是龙山

时代所不能比拟的。青铜器优于红铜器，优于石器。青铜器冶铸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种类和数量的增多，预示着青铜器使用范围的扩大，而其结果必然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必然会提高生产力，必然会使生产品有比过去更多的剩余，而这正是文明产生和赖以维持的前提。

墓葬与居址反映的贫富与阶级分化是社会进入文明的必要条件。二里头文化发现的墓葬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第一等是二号宫殿基址下压的M1<sup>⑬</sup>。M1位于二号宫殿中心殿堂北面不远，长方形，墓口东西长5.2—5.35、南北宽4.25米。墓内有生土二层台环绕墓室，墓室已被盗一空，仅残留有涂朱的陶龙头、漆皮、蚌饰片及似置于一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M1打破二号宫殿庭院夯土，但又被紧依北墙所建的短廊所压，其时代和二号宫殿同时，而且连为一体，因此，不少学者据此怀疑二号宫殿即是当时的宗庙。M1是迄今二里头文化中所发现的最大的墓葬，显系王墓无疑。第二等是以二里头遗址等地发现的随葬有青铜酒器爵、斚、盃或仿铜陶爵、斚、盃以及玉戈、玉钺、玉璋等礼器的墓葬。其中随葬有青铜器的墓，墓室面积略大，一般在2平方米左右，随葬品的数量也较多。例如1984年秋在二里头遗址Ⅵ区发掘的M9<sup>⑭</sup>，墓坑南北长2.4、东西宽0.8—0.9米，随葬青铜爵、斚各1，陶盃、大口尊各2，另有陶簋、圆腹罐、器盖、圆陶片、漆觚、海贝等。随葬仿铜陶爵、斚、盃等礼器的墓墓室略小，一般1.5—1平方米左右。例如1987年在二里头遗址Ⅳ区发掘的M44<sup>⑮</sup>，墓室为1.8×0.5—0.3米，随葬有陶爵、盃、圆腹罐、直领罐、敛口罐、卷沿盆、漆器、圆陶片等。这类墓葬有规整的墓室，能随葬铜或仿铜礼器、玉器，应是具有贵族身分的人的墓葬。第三等是有正常的墓室，随葬少量生活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小型墓，墓室面积小于1平方米。例如1966年在洛阳东马沟发掘的

M9<sup>⑦</sup>，墓室长1.92、宽0.55米，仅随葬陶平底盆、豆、三足器各一件。这类墓数量最多，和能随葬铜、陶酒器的墓共处于同一墓地，应是一般平民的墓葬。第四等是无规整的墓室和葬式的非正常埋葬，一般见于灰层和灰坑中。例如1960—1964年在二里头遗址V区发掘的M205<sup>⑧</sup>，死者“俯身，头向西，两手上举过头，手腕相交，躯干弯曲，下肢伸开微屈。推测是双手被缚而遭活埋的。”显然这类人不是战争的俘虏就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奴仆。二里头遗址的居址也有较多发现。一类是面积较大、建筑比较讲究的地面建筑，例如1960—1964年发掘的N区F4<sup>⑨</sup>，“呈东西长方形，长9米多，残宽3米多，居住面坚硬并铺有薄层料礓面。”N区F9<sup>⑩</sup>，“呈南北向长方形，居住面坚硬呈黄褐色，长约10、宽约5米。”周围有柱子洞，“在东北角还发现一个瓢形的烧灶。”一类是面积小的半地穴建筑，例如1982年秋九区发掘的F1<sup>⑪</sup>，“穴深约1米，穴口外移，贴穴口外侧为木骨墙。……居住面为厚约10厘米的红夯土，范围东西长约4米，南北宽约3.3米。……南壁下筑有一南北宽0.7—1.1、东西长2.95、高0.4米的草泥土台子，台面平坦，拐角圆抹。”1980年秋N区发掘的F1<sup>⑫</sup>面积更小，“上口东西长3.05、南北宽2.4米，屋内地面东西长2.90、南北宽2.15米。……深0.94米。屋内东北角有一近圆角方形的灶坑，……居住面中央有一圆柱洞，……西南拐角处有斜坡状（由外向里倾斜）的门道。”这两种规格不同的房子，其主人的地位肯定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也许是贵族的住屋，后者大约是一般平民的栖身之地。

大型宫殿建筑的兴建与专门青铜武器的使用是国家产生的标志，而国家则是文明的概括。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部位已发现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一号、二号两座基址的材料已经发表。一号基址为一大型夯土台基<sup>⑬</sup>，“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南北

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方向为北偏西8度，基本上是坐北朝南。现存地面平整，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其基座略高出周围的台基面，呈长方形，东西约36、南北约25、夯土厚约3.1米。基座底部铺垫有三层鹅卵石，用以加固基址。殿堂立于基座之上，也呈长方形，东西长30.4、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檐柱洞或檐柱洞遭破坏留下的柱础石，每一个檐柱洞外侧还附属有两个小柱洞或柱础石，可能是支撑殿堂出檐的挑檐柱洞。“从檐柱的排列，可以看出这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间的建筑。挑檐柱的存在，说明殿堂的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式。”《考工记》所说的“四阿重屋”应即指此。在宫殿四周有一圈廊庑建筑，位于殿堂正南的大门是一座间阔八面的牌坊式建筑，殿堂与大门之间则是开阔的广庭。显然这组宫殿建筑是按照一定的设计方案建成的，很可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议事和发表政令的场所。二号宫殿<sup>⑭</sup>位于一号宫殿东北约150米，台基呈长方形，东西约57.5—58、南北约72.8米，台基之上有一组包括中心殿堂、大门、廊庑和围墙的建筑，在中心殿堂之北和北墙之间有一座编号为M1的大墓。中心殿堂建在东西长32米多、南北宽12米多的夯土基座上，为一东西长约26.5、南北宽约7.1米含有三室的大型建筑。大门位于中心殿堂南面略偏东，由东西一排三间房子组成，中间一间稍宽，为大门门道，东西两间即文献上讲的“东塾”、“西塾”。四周皆有围墙和回廊，东西两边为里廊，南边为里、外复廊，北边在北墙中心部位有一段短廊，亦仅有里廊。中心殿堂正南和大门之间是广庭。整体建筑宏大而又严密，其布局与清代学者戴震《考工记图》所绘先秦宗庙图非常相似，加之与其相关的大墓，推断其为宗庙建筑是颇有道理的。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武器主要有戈和戚两类。戈和戚就其形制而言，可能是由新石器时代

农业工具石镰和石斧演化而来,但此时已成为专门用于战争和刑杀的武器。不论对一号和二号宫殿的具体功能有什么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它们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活动的地方。而专门青铜武器的出现则毫无疑问是当时已存在国家机器的支柱——常备军的证明。

当然,二里头文化尚未发现文字记录材料,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丁公陶文的发现,使我们毫不怀疑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用于书写的文字,只是还没有被发现。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继夏而起的商代为什么会有发展程度那么高的甲骨文。

在有关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关于构成文明的要素有着不完全一致的主张。我认为对此应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就古代中国最早的文明——夏文明来说,以上所提到的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器的使用、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的形成、大型政治性与礼仪性建筑的兴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无疑是缺一不可的。其实这些所谓要素有许多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只不过发展程度还不够高,还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过程中。因此,我们在判断一个时代、一个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文明的时代,不仅要构成文明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否已经存在,而且还要进行量的分析,看这些因素的发展程度如何。我们之所以认为龙山时代是由野蛮到文明的转变时代,二里头文化阶段即夏代才是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正是对文明诸因素的发展程度作了具体分析的结果。

## 五

当我们追溯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文明因素很早以前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燕山南北等地区即已产生,至龙山时代中原

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更具有大体相同的发展高度,为什么最后在中原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明,而继山东龙山文化而起的岳石文化、继良渚文化而起的马桥文化却未能同二里头文化同步一起跨入文明的门槛呢?

对此问题,不少人曾经进行过推测和探讨,但迄今未得到满意的答案。

如果将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三者综合比较分析,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原龙山文化之所以能够率先进入文明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中原龙山文化居于当时几支大的铜石并用文化的中心,客观上有利于吸收周围及邻近同期文化的先进因素。在这方面,有学者已经举出了以鼎、豆、壶、鬲、甗、觚、盃等为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礼器,以琮、璧、钺为代表的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它们都是形成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商文化中最有特征的文化内涵的主要来源。

第二,中原龙山文化居中的地理位置,在当时部落冲突与联合的复杂斗争中必然占有主导地位,一方面是自己向外扩张,一方面又成为周围及邻近部落集团争夺的主要对象。这种连绵不断地冲突与战争,势必促进占有主导地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居民部族中国家机器较早的出现与完善。戈、戚等专门青铜武器最早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三,龙山时代大体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代,而根据文献记载,尧、舜、禹时代正是中原地区洪水泛滥时期。人们在同洪水作斗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传说夏部落的首领鲧因治水不成而被处死,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sup>[6]</sup>,终于治服洪水,并因此依当时实行的禅让制继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长,至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治理洪水是一项系统工

程,既需要严密的组织工作,又需要有绝对权威的指挥,这客观上无疑会较其他地区以更快的速度促进国家机器管理公众事务职能的产生。

以上三点推测,尽管不能圆满解决为什么二里头文化率先进入文明的问题,但至少是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文明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文明一经产生,又一定会促进社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夏文明产生之后,仅仅过了四百多年,在它所奠定的基础之上便形成了更加灿烂的商文明,这决不是偶然的。

(此文是为庆贺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先生88岁寿辰而作,1995年初曾以日文发表于日本出版的《文明学原论》论文集中,现将中文稿借《华夏考古》一角发表,请各位批评指正。)

#### 注 释

- ① 徐水县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 ②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
- ③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
-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 ⑤ 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2期;《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4期。
- ⑥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2期;王永波等:《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10期;《湖南澧县

彭头山新石器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 ⑧ 陈振裕、杨权喜:《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1》;《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⑩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2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 ⑫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略》,《文物》1961年11期。
- ⑬ 浙江省文管会:《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8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5期。
- ⑭ 牟永抗、魏正瑾:《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1978年4期。
- ⑮ 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1938年。
- ⑯ 同⑮。
- ⑰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⑱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 ⑲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 ⑳ 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6期。
- ㉑ 张忠培:《齐家文化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1、2期。
- ㉒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沕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 ㉓ 中原龙山文化系指分布于河南、河北、山西省晚于仰韶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遗存。分布于河南省的又称为河南龙山文化,分布于山西省南部的又称为陶寺类型遗存,分布于豫北冀南的又称为后冈二期文化。从其文化内涵分析,是不同于典型龙山文化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 ㉔ 山东龙山文化是分布于山东、江苏省北部以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以蛋壳黑陶为突出特征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

(下转58页)



度以巨大的冲击,成为国家产生的催化剂。其次,该地区自古就是水患最严重的地区,尤其是河济之间的兖州之域。共工以水行霸,洪水的传说和鲧、禹、四岳治水的故事,主要在古兖州地域。水患是该地区比战争更具威胁的、经常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想解决洪水泛滥和大范围的水患,就需要疏通河道,修筑堤防,进行统一规划,上下游的部族共同实施;需要组织大量的劳动力,统一指挥。所有这一切,氏族社会的原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治理水患的需要,是促使该地区由原始向文明过渡的基本因素之一。正是为应付频繁战争和消除经常存在的洪水威胁,促使该地区氏族社会迅速瓦解,有可能较早地出现职业军队,出现城,较早地产生国家。基于上述分析,即便现在还不知道教场铺和景阳岗龙山中大小夯筑台址的功能,也不妨大胆地说它是两个古国之“都”。假如教场铺

龙山城果真是虞舜之都,那么有虞确是个东夷古国,虞舜已处于文明时代了。

# 注 释

- ① 《逸周书·尝麦篇》。
- ② 《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三经》郝懿行疏。
- ③ 《尚书·吕刑下》。
-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商》,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吕思勉:《读史札记·说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 ⑤⑦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五本,第一分册。
- ⑥ 郑杰祥:《夏史初探》,第9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 ⑧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 ⑨ 《左传·成公十三年》。
- ⑩ 《史记·五帝本纪》。
- ⑪ 《左传·哀公七年》。
- ⑫ 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3期;石河考古队:《湖北石河遗址群1987年考古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 ⑬ 施昕更:《良渚》,1938年。
- ⑭⑮ 所列龙山时代古城堡和良渚文化中的礼制建筑在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载《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一文中均有提及。
- 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 ⑰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4期。
- ⑱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⑲ 赵朝洪:《有关岳石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
- ⑳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㉑ 李伯谦:《马桥文化的源流》,《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㉒ 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华夏考古》1987年2期。
- 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 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
- 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附墓葬登记表,《考古》1992年4期。
- ㉖ 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年1期。
- 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 ㉘ 同㉗。
- ㉙ 同㉗。
- 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2期。
- 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 ㉜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图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
- ㉝ 同㉘。
- ㉞ 《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